



## 壹、前言

猶記得高三畢業那年夏天的某個午后，甫進行完上課前的問候禮儀，地理老師緊接著就問我們這群女生上大學的理由，有個同學立即回答：要嫁個好先生…。當時的自己對性別尚是不察，就和著同學們的笑鬧聲，上完了接下來的課，日後有機會和其他領域的人討論性別議題時，「上大學是爲了嫁個好先生」的說法，成了例子。

女性從出生的原生家庭、到進入婚姻，整個過程充滿規範性的安排，在如此富有秩序感的緊密規範安排中，女性自小就甘心情願、自動自發的許下要進入婚姻家庭的美夢，夢境是：拖曳純潔白紗、盛大隆重婚禮、才子佳人深情擁吻，然後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當深情擁吻結束、隆重婚禮撤場、拖曳白紗褪去之後，新娘算是正式拿到進入婚姻家庭的入場券，開始承擔來自父權結構嚴密設計規範安排中一連串的角色責任：妻子的、媳婦的及母親的。

值得再繼續觀看與分析的是，女性在增權的現代化過程中，或是運用教育程度、或是運用經濟能力、或是運用個人自我意識的

提升，來改善環境中尊卑的兩性角色處境，但似乎並未能真正跳脫父子軸家庭的文化規範（蔡文瑜，2007）。身處原生家庭的女性，僅是延伸了女性的家務勞動，與更加認可於以父親爲核心的權力安排位置，進入婚姻家庭，於是形成中、高學歷之女性偏好以男性爲主的婚姻家庭設計，男高女低的婚配婚姻階梯設計中，不僅是限制了女性選擇婚姻對象的空間，特別是當男性配偶刻意維繫男尊女卑的性別位階時，婚姻中的女性將因此陷入：未能實現婚姻規範而需承攬極大角色扮演的責任與壓力（陳君婷，2007；陳美如，2006；蕭淑仁，2003；歐宇帥，2001）。莊廣婷（2006）研究指出，父子軸文化的設計讓婚姻成爲女性最終的生命價值核心與身心歸宿，意即婚姻家庭成了女性實踐生命價值與安放身心的最佳場所。至此，既然婚姻是父權社會爲鞏固父子軸文化而建構之鎖權策略，終能明瞭「上大學是爲了嫁個好先生」話語中的深切期盼。女性進入婚姻家庭之後，真能如童話故事中所言：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在筆者加入一個爲受暴女性倡權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接觸到遭受配偶

暴力相待的女性與她們的孩子之後，終願相信：婚姻之家往往也是為女性帶來傷害的源頭。

婚姻暴力一直是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議題，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的這近十五年，在政府與民間的努力之下，社會大眾已漸能揚棄父權思維而傾向於理解與同意對女性的暴力是犯罪問題、人權議題。劉可屏（1987）以「虐妻問題」為題，發表臺灣第一篇以婚姻暴力為主題的學術文章，此舉為國內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探討植下初生之苗；1993年10月，發生鄧如雯女士殺夫事件，適逢，同時期的世界婦女高峰會議在臺北舉行，婦女團體積極討論此案，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因之引起更多國人關注存在於臺灣社會中的婚姻暴力問題。

臺灣的婚姻暴力問題在歷經《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與修法之後的現在，究竟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何呢？我國在婚姻暴力發生率的相關方面研究相當匱乏，「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家防會）曾經委託王麗容等（2003）進行全國婚姻暴力調查研究，結果顯示17.4%的臺灣婦女曾在婚姻中遭受暴力對待，從家防會2009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全國通報家庭暴力的案件數有89,253件，其中屬於婚姻關係暴力者約占53%，而女性受害人占了近八成；這些數字在在都說明：婚姻暴力事實是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而受害者以女性為主。

為能更理解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受暴經驗與掙脫行動，茲從女性在家庭的位置及暴力中的女性兩個面向討論女性與婚姻暴力的

關係。

## 貳、女性在家庭的位置

美國作家艾默生曾說：家庭是這樣一個地方，在一日之中，人們的胃口得到三餐滿足而心靈得到千百次的滿足。家總是被形容為避風港灣，就如同臺灣國立編譯館編寫之國小課本內容：「無疑的，家是最可愛、甜蜜的安樂窩。我們的生命始於家庭，在濃濃的親情中，不斷的成長、茁壯」。

用浪漫及整體化的方式將家一筆帶過，卻忽略當中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更加模糊了傳統異性戀父權家庭制度下女性的困境（吳瑾嫣，2000）。而中國傳統所謂的「三從」，也清楚說明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女子未嫁之時要遵從父親、出嫁後要順從先生、先生死亡且尚需聽從兒子。我國民法親屬篇對於子女繼承權未規範性別的排除，但民間習慣總是要女兒主動「拋棄繼承」來成就家內兄弟完全的財產繼承權利，就如顧愛如（1993）所言：女兒終究是要嫁給別人，成為其他家庭中的財產。又依據民間習俗，臺灣漢人社會中女兒是被排除在原生家庭宗族祭祀之外的，傳統流傳女性若是未嫁勢必成為「無主的鬼」，故未婚女性值適婚年齡，總會面臨催促結婚的壓力，父母也擔心未嫁女兒死後的安排。進入婚姻，果真將如童話所描述「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的結局嗎？從受暴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脈絡來看，幸福和快樂或如海市蜃樓看似真實卻是幻影！彭淑華（1998）指出「在父權思潮與權力不均衡下，女人往往被男人視

為財產，使得「結婚證書就是一張打人證書」（the marriage license as a hitting license）。在權力關係不平等的婚姻中，家對女性而言，是製造壓力與暴力的上游工廠。

家庭對女性的意義從兩個層面說明：原生家庭「女兒」身份及婚姻家庭「妻子」角色。首先是原生家庭之於女兒身份，男性與女性從落地出生，就已運用「弄璋」與「弄瓦」之詞彙，區隔出性別期待與生活資源的型態分配。儘管從農業社會跨至工業社會，儘管女性權力意識萌芽、崛起，對多數的父母而言，住宅的代間轉移仍以兒子為主要繼承者（王君茹，2003；許秉翔，2002）。除了生活空間及資源分配的多寡與權重之外，女性在原生家庭亦不乏受到壓抑甚至壓迫的經驗（陳柔吟，2006；蕭淑仁，2003；歐宇帥，2001）。

再從性別規範觀之，原生家庭將女性定位成「別人的家神」，家庭對女兒的唯一教養原則就是「順利出嫁」（游淑君，2006）。為免女兒出嫁之後落入「養女不教」的社會責難壓力，原生父母除了教導未出嫁女兒要習慣於「三從四德」，復又嵌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杜絕女性在原生與婚姻家庭的自我知識發展空間。缺乏生活資源的空間及充滿父權思維的性別規範，讓女兒們往往萌生離家的想法；偏偏忍讓又是華人慣常用來因應生活衝突的策略（黃光國，2005），未婚女兒不將對生活資源與性別教導的不滿浮上檯面、引起原生家庭衝突，相反的，女兒們會希望在原生家庭之外，發展與實踐另類的家庭想像（歐宇帥，2001）。問題是，在人身安全與經濟資源相對性的限制之下，

未婚女兒們往往延遲或終止個別的離家行動（陳吟柔，2006；林谷蘭，2003；歐宇帥，2001），取而代之的是運用「結婚」做為離家的行動策略，但「之子于歸」的婚姻規範，將婚嫁女兒視如「潑出去的水」，讓婚嫁女兒與生養娘家之間劃出壁壘分明的斷裂，以致當婚姻出現暴力時，非正式資源「娘家」的出手支援，往往瞻後與顧前（鄭玉蓮，2004）。

其次是婚姻家庭之於妻子角色，在以父子軸為基礎的文化思維之下，女性以「之子于歸」的婚姻模式完成了終身大事（蔡文瑜，2007）。游淑君（2006）對「歸」字提出兩種意涵：一是女性要依婚嫁規範，由娘家轉歸向夫家，二是女性要進行子嗣傳承，為死後的姓氏歸屬留下痕跡，即是進入夫家的公媽神主牌，換言之即是追求身後靈魂的最終歸宿。依此「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鬼」之邏輯，女性幾乎是沒有離開的機會與權利。讓女性視婚姻為個人生命核心價值與終其生身心歸宿的父子軸文化設計，女性將愈趨隨著社會輿論規範舞動，不輕易走出婚姻家庭之外（莊廣婷，2006），同時道德禁忌的內化，也讓女性願意固守婚姻家庭的刻板輪廓。回到過去有關家的意義研究，Hyaward（1975）發現女人較常將家視為自我認同的表達，但婚姻中的男性呢？許娘光（Hsu，1971）研究，同在父子軸的女性，視婚姻為一輩子的命運、但男性卻僅將婚姻視為暫時的命運。畢恆達（2000）指出家的意義對女性而言，是重要的社會關係，同時也是一個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場所，而男人往往僅將家視為一個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

女性之所以留滯在婚姻家庭中，和過去的農業社會生活形態息息相關，因為生活空間僅有內-夫家、外-娘家的區分，女性需要傾權力關注於婚姻家庭，期待藉由完全的勞動力與道德規範為個人爭取可能的超越空間。歷經現代化歷程啟動帶來的影響，女性的伸展空間範疇已然跨越農業社會的設計，如此的跨越鬆動了女性對婚姻家庭的專注聯結。即便如此，仍需謹記，女性進入夫家的名義是「續香火」、「旺家族」，婚姻家庭並不鼓勵結為夫與妻的男性與女性發展個別情感，所謂的「在家從夫」，此「夫」絕非單純的僅意指先生，實質是包含夫家整體！故此，當婚姻中發生了暴力，女性即使想離開，亦需面對不斷出現「尋求復合」的反向力量。當女性的婚姻家庭，因配偶的暴力行為出現難以持續的狀況時，女性會選擇原生家庭為其社會支持系統，但從研究觀點發現，這卻也是女性生命經驗飄零感的來源之一（吳婉慧，2000；韓貴香，2000；李雅惠，2000）。原生父母將未婚女兒視為過客，今既已結婚，娘家再無角色介入，若當真伸出援手，也立基於無奈心情。當受暴女性因婚姻陷入急劇痛苦時，「認命」、「三從四德」與「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等傳統的刻板角色規範認知，著實讓女性在「隱忍」與「離開」之間，被釘成鐘擺、遲遲無法做出決策（賴美言，2002）！

## 參、暴力中的女性

原生家庭形塑了女性在「家庭」的性別

角色與生活資源分配形態，如此的形塑影響及於婚姻家庭。長久以來，人們對遭受婚姻暴力的女性留在配偶身邊的決定感到不解、甚至充滿疑惑，其實，並非所有的女性都選擇留在關係中，實務上的經驗發現：有些女性在單次暴力事件發生後，毅然決然離開配偶。然而，絕大多數女性，都曾在受暴關係中與配偶維持一段共同的生活時間，甚者五、六年或十幾年，最後方離開受暴關係、獨立生活。不論如何，「離開」對女性而言，往往歷經多次的來回與反覆。

首先為婚姻暴力進行定義。我國家暴法所稱婚姻暴力為第三條第一款：配偶或前配偶及第二款：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本篇關注在正式婚姻中遭受暴力對待的女性，以第三條第一款所規範為主要定義。在傷害態樣方面，Schecter 及 Ganley（1995，彭淑華譯，1999）將婚姻中施暴者的行為分成身體的、性方面的與心理的三種基本的攻擊型態，再加上經濟上的攻擊，又心理方面常無法立即顯示出影響，於是兩位學者補充說明心理的攻擊內容包括：暴力及身體傷害的威脅、對於受暴者在意物品或寵物的攻擊、情感虐待、隔離及利用小孩。基於上述文字，為本文的婚姻暴力工作定義：先生對妻子的強制與控制行為，包括身體、性、心理及經濟的攻擊。

婚姻中的女性是如何應對配偶的暴力對待又如何掙脫暴力？研究指出，暴力的發生對女性影響甚鉅，影響的層次面向包括經濟的、身體的、心理的（李碧琪，2003；彭淑華譯，1999；Wiehe，1998；Dergman & Brismar，1991）。女性在面對暴力行為的歷

程承受多重壓力及巨大衝擊，爲了在其中生存，將發展出因應的行爲與策略。Saunders 於 1988 年提出對「因應」（coping）的說明，指出因應是個體用來處理威脅的策略，是一種過程，而非單一的純粹行動。Lazarus 曾於 1984 年提出壓力認知評估理論的主張，指因應方式是個人評估其內在或外在要求，超過或低於個人所擁有的資源時，運用自我強度（ego strength）在認知上或行爲上所做的衝突與需求調適的改變。

從湯琇雅（1993）的研究發現，女性受暴的因應策略可分爲消極與積極，前者如忍耐、安撫/哀求施暴配偶、企圖逃離暴力現場及壓抑，後者如反擊、尋求協助、說之以情/動之以理。遭受暴力後的反應則有以情緒爲導向的因應行爲，像是合理化、壓抑、轉移、隔離、或是強化宿命想法、尋求宗教慰藉、或尋求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以排解心內苦悶並獲得解脫，以問題爲導向的因應則是回到施暴者身邊或是離開施暴環境。以上回應行爲又存有其他因素，如許維倫（1997）的研究發現，女性教育程度愈高，對自身的婚姻狀況就愈具省思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受暴女性所擁有的內外在資源充足與否亦將會影響女性選擇何種取向的因應方式。不論女性面對暴力行爲的因應方法爲何，若心理面與行爲面的策略失效，暴力已然顯現常態性及重複性、暴力循環的螺旋向外啓動（Kirkwood，1993），受暴女性會進入脫離暴力的「覺醒」階段，爲「準備/行動期」做預備（吳震環，2007）。但離開暴力關係真能如此輕易？脫離暴力的過程中是否存有困境？嘗試由女性離開暴力婚姻家庭的歷程來理解其中的經驗

與困境。討論包括在受暴關係中鼓起勇氣決定離開、在決定離開的勇氣中遭遇困境及在困境面臨需要三方面。

## 一、決定離開

許多研究指出，絕大部分的女性對暴力會演變成循環不間斷的結果是始料未及的。雖然對暴力的發生感到悲傷、忿怒、震驚或是不能理解，然而配偶的事後道歉與絕不再犯承諾，往往讓受暴女性願意相信先生的行爲是壓力過大、無法克制的一時衝動，暴力絕對不會成爲日後生活的常態（Piispa，2002）。但誠如暴力循環理論所論述，施暴者的暴力行爲將一次嚴重於一次，強烈破壞彼此的關係。當女性覺察加諸於身上的暴力是具有重複性與嚴重性的「虐待」（abuse），將陷落於不斷經歷「離開」與「留下」的反覆與來回抉擇中。女性的決定離開受暴關係，會經過幾個階段：

### （一）暴力掩飾期

事件剛發生，女性傾向用否認、低估事件的嚴重程度與後果，無法立於現實的看待暴力事件及事件中的自己與施暴配偶（Burman，2003）；掩飾與辯解，目的就是爲了維持家庭和樂的表象，Smith 在 2003 年提出的「天大的秘密」（the big secret）恰恰描寫女性用來掩飾暴力的形容。女性必需運用「秘密」來掩飾暴力的原因有：一是習慣先自我檢討反省，事件只是偶發、先生也不願意、只要自己改變，情況就能改善，二爲社會文化對女性家務角色的期待與刻板設計，造就讓知悉暴力事件發生者轉而批評與

議論受暴女性，因而促成羞愧感形成求援阻礙（曾月娥，2007；Lutenbacher 等人，2003；周月清，1993）。

## （二）暴力敘說期

隨著暴力發生頻率的縮短、態樣的加劇及嚴重性的提升，女性將開始覺察原先對暴力問題的詮釋與判斷，將「虐待」事件從單一、偶發，看為具重複性，於是從三緘其口，轉而對外述說受暴事實。Fraser 等人於 2002 提出「述說」，指的是女性開始離開沉默的位置，向外求援，初始的述說皆以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為對象，如家人、鄰居、同事、朋友、親戚等（吳震環，2007；黃一秀，1999），對外求援的方法又視暴力事件發生時與配偶之間關係、地緣位置及其特質而定（宋賢儀，1998）。傾聽對象對女性述說暴力事實的回應，將反過來影響她們對個人處境的覺察、認知與選擇（吳震環，2007），此時女性有機會衡量離開與留下的得失、利弊。

由 Walker(1979)提出的「暴力循環理論」(cycle of violence) 回觀上述資料。此理論解釋暴力的動態關係，認為暴力並非常態性的經驗，具有來回與反覆的特性：緊張形成期 → 因長期的衝突無法解決，造成關係的緊張階段；爆發期（緊急期）→ 當衝突緊張氣氛持續增加，爆發激烈爭吵，進而產生毆打行為；蜜月期（寧靜、愛與喘息期）→ 暴力行為發生後，配偶因後悔而請求妻子原諒，於是女性回到施暴配偶身邊，此階段雙方會維持和諧甜蜜的關係，直到下次衝突緊張再起，回復前二階段，不斷循環下去（吳震環，2007；鄭玉蓮，2004；葛書倫，2003）。女

性在暴力循環中歷經關係中衝突的加溫、喘息，喘息、加溫，暴力的掩飾與敘說同時在過程中蘊釀與推擠，終至公開「天大的秘密」（the big secret）。處於暴力循環漩渦中的女性，要如何能借力使力的自漩渦中脫身？「轉捩點」（Patzel，2001：735；鄭玉蓮，2004）的出現是契機。隨著轉捩點的出現，女性會開始經歷 Patzel 所稱的「領悟」（realization）、「重新設想」（reframing）的認知改變過程（吳震環，2007）。Patzel 於 2001 指出，經歷過多次的「轉捩點」事件女性方能做出真正離開受暴關係的決定；故脫離暴力的過程，可能是間歷經好幾次「轉捩點」事件的長期準備結果，或是一次暴力事件後的緊急決定。

當受暴關係出現「轉捩點」事件，女性採取行動後，研究提出，正式的社會支持系統是受暴女性的主要依賴資源，包括警政、醫療、社政、民間組織、司法等所構成的正式社會支持系統，而服務內容包含立即人身保護、緊急庇護、情緒支持、諮商輔導、醫療服務、法律協助、經濟補助、就業服務等等（李碧琪，2003；劉淑齡，2002；葉毓蘭，2001；黃一秀，1999）。非正式系統雖也是受暴女性重要的支持，但因其內容主要以情緒性與資訊性為主，其實質性協助效益遠不如工具性的正式支持資源，如 Goodkind 等人在 2003 年的研究發現，不帶批評提供實質的支持比正向的情緒支持更加重要。非正式支持系統往往鼓勵受暴女性，以忍耐及留在婚姻中的方法，解決關係中的壓力與問題，若得知女性將運用「離開」來結束暴力關係時，原先的支持態度將轉為冷漠、甚至是反對與

阻撓（引自宋月瑜，2004）。此時，若施暴先生將運用於配偶身上的威脅策略，複製施展於提供受暴女性協助的親友，將限制非正式系統對受暴女性脫離暴力關係的效益發揮（吳震環，2007）。

## 二、於決定離開的勇氣中遭遇困境

許多研究用來討論與解釋女性不願離開與無法離開受暴關係的原因，本文歸整文獻，從個人、關係、安全及資源四個面向討論。

### （一）個人面向

肢體暴力容易為女性留下難以復原的後遺症，特別是腦部的創傷，Monahan & O'Leary 就曾於 1999 提出，創傷會致使受暴者腦力衰退、精神疲勞等生理功能退化。Walker 於 1979 年曾指出受暴女性之所以不離開暴力關係是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的結果，提出「受暴婦女症候群」（th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特質，就如同遭受電擊的籠中老鼠一般，女性出現消極、被動及失去任何可能改變的想法，任憑暴力一再發生，也不企圖嘗試可能脫離暴力的方法。面對暴力的反覆出現，嘗試的徒勞無功，再加上施暴配偶的威脅、恐嚇及期待親友協助的希望落空，將削弱女性求援的動機，使其陷落在無法脫離的暴力關係中（引自宋賢儀，1998）。其他如創傷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連結（traumatic bonding）等都說明受暴女性長期在施暴者控制的環境中，與之產生緊密的依附關係，受暴女性失去獨立自主及思考的能力，也無法為自我做出有

利的選擇。

### （二）關係面向

情感因素是多數受暴女性自述可能回到施暴者身邊的原因（Griffing 等人，2002）。當從關係面向來詮釋受暴女性留在施暴配偶身邊的原因時，可以發現女性的留下原因不單單只是因為依賴與軟弱，並非是沒有施暴者就無法獨力生活，事實上如 Gondolf 與 Fisher 在 1998 提出的，受暴女性仍努力嘗試要在暴力關係中改善、保護與維繫夫妻情誼。暴力畢竟非關係的全部，在暴力之外，女性仍能感受彼此之間存有的愛。正因為對先生的同情與理解（Mills，2003/2004），及「關係中自我」（self-in-relationship）概念（劉珠利，2003），女性從小被訓練為照顧者角色，相較男性是藉由與他人分離發展自我，女性往往是經由與他人的關係來找尋自我位置。Belknap 在 1999 年的研究也發現，維繫關係的能力對女性之自我感很重要，使女性在面對婚姻暴力威脅時，做出極不合理的決定。女性顧慮與配偶的情感關係，也重視與配偶雙親的關係維繫，希望給孩子完整的家庭。此外，配偶對傷害第三者的威脅，如小孩及親友等，讓女性為了保護所珍惜的關係與重要他者，而選擇留在受暴關係當中。對女性而言，與施暴配偶、孩子及其他重要他者之間關係的保有及保護，遠遠較自我的人身安全重要（Belknap，1999）。

### （三）安全面向

許多研究提出分離攻擊（separation assault）的概念（Mahoney，1991；Saunders &

Browne, 1990), 打破了一般認為受暴女性離開先生就能終止暴力的迷思 (myth)。施暴配偶往往利用子女監護權、傷害女性重要物品、騷擾女性身邊親友及自傷/自殘等方式恐嚇與威脅, (褚杏子, 2001; 黃一秀, 1999; 陳婷蕙, 1997; 周月清, 1995) 緊掐受暴女性的弱點。從上述分離攻擊 (separation assault) 概念而論, 受暴女性經常在準備與決定離開關係之後, 遭到更嚴重的攻擊。受暴女性為了積極避免激怒施暴配偶, 在匱乏之下做了留在關係中的決定。

#### (四) 資源面向

經濟依賴因素在資源面向上經常被提出討論。Strube & Barbour 1984 年的研究發現, 沒有工作的女性, 因經濟仰賴先生, 易留在暴力關係當中。Lutenbacher, Cohen, & Mitzel (2003) 進一步的討論, 即使女性有工作, 為了避免配偶的騷擾, 可能選擇離開原先工作, 將自己與已建立關係的生活資源切斷, 另起生存爐灶。郭玲妃、馬小萍 (2002) 指出, 社會普遍存在對高齡就業者的歧視心態, 阻礙了受暴女性的職業選擇, 女性即使找到工作, 薪水也不理想。職場的限制與不利, 再加上女性尚有未成年隨行子女一起獨立生活, 養家與照顧責任的一肩扛壓力, 促使女性打消脫離暴力的想法, 上述經濟困境將使受暴女性對獨立生活計畫倍感卻步。資源面向的另一個因素是社會支持網絡孤立。女性要能真正脫離暴力關係, 個人內在力量雖然不可或缺, 但單憑女性本身力量是無法達成目標的。研究已知, 受暴女性的脫暴需要社會支持系統的協助 (曾月娥, 2007; 許

維倫, 1997), 回觀我國社會文化層面傳統刻板的性別分工與期待, 強調父權思維, 視婚姻暴力為「不可外揚」、「難斷」的「家務事」, 阻斷了受暴女性對社會支持系統求援的道路, 女性在脫離暴力的過程中, 性別階層化的結構, 成為最大障礙 (莊凱琪, 2008; 吳震環, 2007; 鄭玉蓮, 2004)。

部分學者嘗試將上述影響受暴女性無法或不願離開關係的四個面向因素, 區分為「受困」(entrapment) 與「選擇」(choice) 觀點 (Dunn, 2005; Ben-Ari, Winstok, & Eisikovits, 2003; Peled 等人, 2002)。第一種觀點認為受暴女性因資源、個人面向而「受困」(entrapment) 於關係中, 若此時能克服經濟依賴、獲得社會支持及增強其意志力與理性判斷, 必然離開。第二種觀點則立基於女性的不脫離暴力是經過理性評估思量、將利弊好壞皆周詳考慮後的「選擇」(choice), 並非困坐愁城; 關係面向與安全面向因素適可以說明。究竟「選擇」或「受困」的歸因觀點較適用於對受暴女性的留下或離開關係的原因? Ben-Ari 等人 (2003) 的研究發現, 以上兩種的區分觀點對受暴女性而言, 完全的區辨困難且又無實質意義。譬如資源不足或可能造成女性的脫暴困難, 但也或許是受暴女性幾番思量去留的利弊得失後的選擇, 又譬如女性對關係的看重, 也或許是長期處在性別期待與分工刻板的社會文化中, 受暴女性長出的內隱限制。Ben-Ari 等人的研究發現或恐是個重要提醒, 受暴女性的離開或留在關係中, 自有其主觀的考慮和思量及客觀的阻礙和限制, 理當回歸於受暴女性的環境脈絡中, 避免走入過於簡化的歸因胡同。



### 三、在遭遇的困境中面臨需要

對外求援是女性能否得以順利脫離暴力的重要因素（陳婷蕙，1977）。周月清（1993，1997）的研究發現，受暴女性第一次的對外求援以非正式支持系統為主要對象。然而依據黃一秀（2002）的研究知悉，受暴女性娘家支持系統以情緒性支持為主，較少實質性的支持；而婆家的回應多屬於負向。女性在受暴之後，可能因為缺乏支持網絡，或得不到非正式系統中娘家、婆家與朋友的支持，於是轉而求援正式支持系統。社會支持是女性決定離開暴力關係的關鍵之一。Vachon 與 tylians（1988）將社會支持描述為：個體藉由正式與非正式的方法，和個人及團體接觸，因而獲取訊息、安慰與協助。Jacobson 於 1986 年將社會支持區分為三種類別：分別是訊息性的支持（cognitive support）、情緒性的支持（emotional support）及實質性的支持（material support）。

- （一）訊息性的支持：指的是協助對方了解並區辨問題，進一步促進其改變。包括提供相關訊息、知識、勸告及指導修正。
- （二）情緒性的支持：指的是提供對方安慰、鼓勵、同情理解及肯定，進而增強其信心。使對方覺得被瞭解、被接受。
- （三）實質性的支持：指的是直接提供對方具體服務或物質給予。包括金錢、或是替對方處理困難。（引自鄭玉蓮，2004）

社會支持是人際之間互為交往聯絡的過程。其來源廣自社會網絡、小自個體的重要他者；其內容則包含訊息性的、情緒性的及實質性的支持。宋麗玉（2002）曾整理社會支持網絡介入的基本假設，其中提到：個體

在遭遇事件時，需要資源以因應伴隨事件而來的問題與困境，此資源包括個體的外在資源與內在資源，而社會支持網絡即屬於前者；又可區分為非正式支持系統與正式支持系統。Cohen 與 Wills（1985）曾主張社會支持透過以下兩種機制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在壓力事件中，減輕個體壓迫感與減輕個體對壓力的過度反應；及提供個體正向經驗，促使個體對社區扮演回饋角色。

受暴女性在面對重複性暴力行為的因應策略可能是予以反擊、更敏銳的覺察暴力即將發生而預前躲避，或是企圖控制局勢（Eisikovits，2002；Wuest&Merritt-Gray，1999）。不論是對暴力行為模式的先見之明，或是因歷經暴力事件的經驗法則，直到「轉捩點」事件的出現，女性或將立基於轉捩事件出現的強度與頻率，做出脫離暴力關係的決心與行動。

從婚姻暴力受暴女性脫離暴力關係歷程的文獻回觀，女性看待暴力事件對自身影響的認知與理解往往經歷不同階段，而不同階段的認知與理解又同時為其帶來因應事件策略的限制與引領（宋賢儀，1998；Carlson，1997）。「促使婦女決意離開施暴者、並採取實際行動的導火線事件有二，最主要的一項是重大暴力事件，其次則是配偶外遇」（吳震環，2007）。若此時女性理解到關係再也無改善的盼望、意識到目睹暴力對子女身心發展的不良影響、暴力事件及於子女、察覺到身邊確實存在可運用的資源時，女性將會興起或採取脫離暴力關係的選擇（沈慶鴻，2003；郭玲妃、馬小萍，2002；黃一秀，1999）。Senter 和 Caldwell（2002）曾經提出「承認虐

待關係現實」，用於說明當受暴女性對上述情形有所體認，將更能立於現實，整理自我受暴歷程，重新思考及整理與配偶之間關係，願意慎重放棄對婚姻的梦想與期待。當整體情境為女性受暴處境帶來未曾有的看見與覺察時，她們更願意用「虐待」來描述自身所經歷的一切，而有能力不再相信自我的委曲求全能讓先生改變、對為何發生暴力事件也不再感到困惑，能依據新的體認與理解，做出不同以往的決定。正如 Belknap 的研究所

言，女性終於能在依附施暴配偶感情、顧慮父親與孩子關係、保護自己與孩子安全及維繫與他人關係等等牽掛所形成的困境中，辨識孰輕孰重而做出離開的選擇。

深深祝福所有的姐妹！

（本文作者為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主任）

**關鍵詞：**婚姻暴力、原生之家、父權結構、性別

## 📖 註 釋

註 1：本篇改寫自賴文珍（2012）。受暴女性經驗家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 參考文獻

- 王麗容（2003）。臺灣地區婚姻暴力問題之調查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 王君茹（2003）。家產繼承偏好的臺灣經驗：族群、世代婚姻狀況、與社會結構位置。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宋賢儀（1998）。受虐婦女與其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互動經驗之探討。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月瑜（2004）。婚姻暴力受暴婦女離婚後的生活適應之研究。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0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紅葉出版社。
- 吳瑾嫣（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都市生活經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震環（2007）。未完成的故事：婚姻暴力受暴婦女脫離虐待關係的歷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
- 吳婉慧（2000）。三代情-以父母支持離婚女兒為例探究代間協助。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月清（1994）。臺灣受暴婦女社會支持探討之研究。《婦女與兩性學刊》，5，69-108。
- 周月清（1995）。《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遇》。臺北：巨流。
- 李碧琪（2003）。南投縣婚暴受暴婦女對保護服務的需求、需求獲得協助情形與滿意度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李雅惠（2000）。單親婦女離婚歷程之探討。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谷蘭（2003）。離巢？不離巢！**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慶鴻（2003）。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保護令申請經驗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彰化師大輔導學報》，24，169-206。
- 曾月娥（2007）。優勢觀點團體工作運用於暴力循環中婦女復元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郭玲妃、馬小萍（2002）。雙重枷鎖：受虐婦女的母職經驗。《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47-90。
- 陳君婷（2007）。臺灣中高教育程度女性之生育動機與抉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社會福利所碩士論文。
- 陳美如（2005）。妻子擁有較丈夫更高學歷之婚姻生活經驗。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婷蕙（1997）。婚姻暴力中受暴婦女對脫離受虐關係的因應行為研究。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陳美如（2006）。妻子擁有較丈夫更高學歷之婚姻生活經驗。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柔吟（2006）。「她」的家-單身女人的成家行動與家空間體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淑華等人譯（1998）。《家庭暴力》。臺北：紅葉出版社。
- 莊廣婷（2006）。傳統、流言與束縛：金門聚福村女性對婚姻與生育的詮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凱琦（2008）。伴侶關係中的安全與自主：以留在施暴者身邊的婦女為主體的服務反思。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2000）。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應用心理研究》，8，57-81。
- 許維倫（1997）。遭受婚姻暴力婦女因應方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秉翔（2002）。當前臺灣住宅的代間移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湯琇雅（1993）。婚姻暴力中婦女受虐狀況與其因應過程之初探。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

- 所碩士論文。
- 游淑珺（2006）。何處是歸家？臺灣俗語中「女有所歸」的女性養成模式與文化反映初探。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76-93。
- 蔡文瑜（2007）。家的意義建構：婚變女性的經驗詮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 黃光國（2005）。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臺北：臺灣大學
- 黃一秀（1999）。婚姻暴力之受暴婦女求助歷程之探討。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葉毓蘭（2001）。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之建構：警察系統之回應與成效評估。內政部委託研究。
- 葛書倫（2003）。婚姻暴力被害人庇護安置措施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 葛書倫（2003）。庇護所在婚暴受虐婦女復原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臺灣經驗之省思。社區發展季刊，101，310-319。
- 歐宇帥（2001）。臺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的居住環境與家的認同。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可屏，1987。虐妻問題。輔仁學誌，19，375-391。
- 劉淑齡（2002）。公部門婦女保護服務社工之協助效益：從受虐婦女角度探討。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劉珠利（2003）。臺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從「關係中的自我」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1，57-69。
- 鄭玉蓮（2004）。受暴婦女脫離婚姻暴力歷程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貴香（2000）。離婚婦女生活資源與適應。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顧愛如（1993）。住宅空間使用的性別差異：三個家庭空間的個案經驗研究。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美言（2002）。唱不停的離合？！一個女性單親家庭的敘說分析。國立臺北師範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淑仁（2003）。青年女性的生活經驗-以高學歷的職業婦女為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所碩士論文。
- Burman, S. (2003). *Battered women: Stages of change and other treatment models that instigate and sustain leaving*. *Brief Treatment & Crisis Intervention* 3(1): 83-98.
- Belknap, R.A. (1999). *Why did she do that? Issues of moral conflicts in battered women's decision making*.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0:387-404.
- Carlson, B.E. (1997). *A stress & coping approach to intervention with abused women*. *Family Relationship*, 46: 291-298.
- Dutton, D.G., & Painter, S.L. (1981). *Traumatic bonding :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ttachments*

- in battered women and the other relationship intermittent abuse*. *Victimology*, 30:139-155.
- Fraser, I.M. (2002). *Social support choice for help with siverelationship : erscep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s*, 17(4) : 363-375.
- Gondolf, E.W., & Fisher, E.R. (2001). *Battered women as survivors: An ternative to treating helplessnes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Goodkind, J.R., Sullivan, C.M., & Bybee, D.I. (2003) .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attered women's safety plann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0(5) : 514-533.
- Griffing, S., Ragin, D.F., Sage, R.E., Madry, L., Bingham, L. E., & Primm, .J.(2002).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self identified reasons for returning to abusiv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7(3) : 306-319.
- Hayward, G. (1975). *Home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 *Landscape*, 20 :2-9.
- Hsu (1971). *Under Ancestor's Shadow*.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rkwood, C. (1993). *Leaving abusive partners*. Thousand Oaks, CA : Sage Publications.
- Lutenbacher, M., Cohen, A., & Mitzel, J.(2003). *Do we really help?Perspectives of abused women*. *Public Health Nursing*,20(1) : 56-64.
- Monahan, K.,& O'Leavy, K.D.(1999). *November head injoury and mattered women: An initial inquiry*. *Health and Social Work*, 24(4) : 269-278.
- Mills, L.G (2004) 。錯的是我們不是我：家暴的動力關係（黃煜文譯）。臺北：商周（原著出版年 2003）。
- Mahoney, M.R. (1991). *Legal images of battered women: Redefining the issue of separation*. *Michigan Law Review*,90(1) : 1-94.
- Patzel, B. (2001). *Women's use of resources in leaving abusive relationships : A naturalistic inquiry*.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2 :729-747.
- Peled, E., Eisikovits, Z., Enosh, G., & Winstock, Z(2002). *Choice & empowerment for battered womenwho stay: toward a constructive model*. *Social Work*45(1) 9-25.
- Piispa, M. (2002). *Complexity of pattern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heterosexual partnership*. *Violence against Women*8(7) : 873-900.
- Smith, M.E. (2003). *Recovery from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A difficult journey*.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4 : 543-573.
- Saunder, D.G., & Browne A(1990). *Domestic homicide*. In R.T. Ammerman & M.Herson(Eds.), *Case study in family violence*(pp.379-402). London : Methuen.
- Walker, L.A. (1979). *The Battered Women*. New York : Happer and Row Publishers.
- Wiehe, V.R. (1998). *Understanding family violence-Treating and preventing partner, child,sibiling, and elder abuse*.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